想起书法那些事

李 动

辛丑年春,与几位文友赴古城绍兴兰亭一游,走马观花地参观了曲水流觞、王羲之亭,以及康熙、乾隆碑等处,最后来到了汉字纪念馆,匆匆浏览了一下中国书法历史,由此想起了中学时代练习书法的经历。

中学第一位班主任叫许振华,其一手板书非常漂亮,工整浑厚,遒劲有力。许老师对学生写字要求甚高,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:“字如其人。你们以后走上社会,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的字,字写得好坏,对你的人生很重要。”

许老师要求同学们每周交一次大楷簿,并将大楷字写得好的本子贴到了教室门口边的墙上,以资鼓励。为了上榜,我开始认真临摹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字帖,竟然得到许老师不少的红圈表扬,还上榜展览。我信心大增,遂经常研习,进步甚快,自我感觉良好起来。

那时我痴迷上了绘画,与我一起学画的邻居吴磊,曾送我一幅其父写的行书,是李白的诗《望庐山瀑布》,其字俊秀飘逸,如字帖一般,见之大为惊讶,感到相差甚远,难以企及,便挂在床头欣赏。

那时街上流行写标语,魏碑体颇为流行,我也跟风练过一阵。到部队后,中午战友们都午睡了,我坚持练书法,临过任政书写鲁迅先生的行书,但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终学书不成,成憾事。

在公安书刊社任总编时,我曾分管过上海市公安局书法协会,听张晓明、钱茂生、刘小晴等书法大家讲课与交流,知晓了颜真卿、柳公权之外,还有欧阳询、怀素、张旭等书法大家,但搞不清其高低先后,这次细看展览,厘清了头绪。

初唐有褚遂良、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蔡稷四大家,欧阳询最为突出,其代表作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其字端庄挺拔、严谨刻历;中唐最杰出的当属颜真卿,其《多宝塔碑》最有名,其字雄健浑博,筋力丰满。苏东坡曾赞:“诗至于杜子美,书至于颜鲁公。”晚唐要数柳公权最佳,他的《玄秘塔碑》棱角分明、骨力劲健。故宋代范仲淹点赞:“曼卿之笔。颜筋柳骨。”

唐朝书法承前启后,发展至鼎盛高峰。前有东晋书法前辈打下的基础,后有宋代四大家,即蔡襄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等,还有元代赵孟頫,明代董其昌、文征明等书法大家。东晋代表人物非王羲之莫属,其字遒美健秀,雍容和穆,骨丰肉润,古朴高迈,最著名的代表作是《兰亭集序》。唐太宗酷爱书法,尤其偏爱王羲之书法,他派人获取了《兰亭集序》之后,命供奉榻书人冯承素等人摹榻若干本分赐太子、王公大臣,并命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书法大家临摹,通过摹榻与临写的繁衍模式,使《兰亭集序》得以传播开来,并流传下去,由此诞生了五个重要临摹本。

纪念馆的展品中存有冯承素、褚遂良的临摹本,感觉难分伯仲。五个流传临摹本中,数冯承素的摹本最为有名,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他的摹本。我在纪念馆商店里挑选了一张冯承素摹本拓片,请书法爱好者戴兄观赏,他原是上海市公安局书法协会会长,一手楷书写得甚好。我问戴兄:“冯承素的字不如初唐四大家,为何其摹本比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虞世南等大家流传更广?”戴兄说:“可能是名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临摹他人的字很难,而冯承素没有自己的风格,学谁像谁,更能乱真。”感到戴兄言之有理。

记得几年前,上海市公安局举办书法大奖赛时,邀请了书法大家钱先生当评委,我家曾挂过他的一副书法对联,那时对他非常佩服,30多年后,我的办公室悬挂着一副他的对联,其字就像小学生的字,七扭八歪,有点古怪,我颇为纳闷。那次他当评委点评书法作品,我好奇地问他:“你为何不挑选基本功扎实的楷书和行书,而是选那些稀奇古怪、东倒西歪的字?”他解释说:“现在流行这样的写法。”我虽不是专家,但总感到抛弃千年的传统和审美习惯,是一种不好的风气。胡乱涂鸦,以丑为美,唯一的解释是放弃苦练,弯道超车。这股歪风之所以流行,与专家放弃原则,随波逐流,不无关系。

窃以为书法是中国经典的文化瑰宝,唐诗是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可谓是珠联璧合,相得益彰。一直想买一本书写唐诗的楷书字帖,这样既可练字,又能品诗,但未能如愿。

我的书法基本功虽欠佳,但我不愿投机取巧,糟蹋书法艺术。为重圆书法梦,决定老老实实临摹古帖。曾买过不少名家字帖,感觉中国书法博大精深,真草隶篆,各有千秋,百家齐放,争奇斗艳,美学趣味,玩味无穷。但字帖多了,无所适从。人的精力有限,难以包罗万象,广而为之,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,挑选习之。比较下来,更偏爱楷书,尤爱欧阳询,遂临摹之,但其字好看难学。临颜真卿的字,我多少有点童子功,且有少年情结,更觉亲切,便又临摹其《多宝塔碑》,每天一张,愉悦心情,修身养性,但愿能坚持下去。

孔子批评子贡解

任寿柏

灯下偶拾

如果说批评是一门艺术,孔子一定是批评艺术大师。

很多弟子都挨过孔子的严厉批评。有意思的是,挨批的弟子对孔先生非但不记恨,反倒更亲近,更崇敬了。

在孔子众多弟子中,子贡勤学好问,“利口巧辩”,胆识出众,能力超群,绝对是“学霸”级高材生。

子贡敢在复杂凶险的乱局中穿梭于齐鲁吴晋越各国,在诸侯间斡旋游说。结果“子贡一出,存鲁,乱齐,破吴,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,使势相破。十年之中,五国各有变”。

仅凭三寸不烂之舌,子贡就把五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,局势为之大变。真是太牛了!

一时间子贡名扬天下,风头无两。他出使越国,越王竟然以君王之礼待之:洒扫道路,出城迎接。甚至亲自驾车把子贡接到国宾馆(除道郊迎,身御至舍)。难怪有人将他与孔子相提并论。

对子贡这样能力超强,又超富有,而且已经扬名立万的弟子,老师还能批评吗?还敢批评吗?弟子还能接受批评吗?

子贡牛,孔子更牛。该批评时,照批不误。

《史记》载,鲁哀公六年,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,困于陈蔡之间。外有重兵包围,内已绝粮多日,处境艰难危险,几乎穷途末路。众皆惶恐,只有孔子安之若素。依然每日“讲诵弦歌不衰”。

子贡成天板着脸(色作)。孔子开导他:赐(子贡姓端木,名赐),你是不是认为我博学并且对所学都已认识并接受了呢?(赐,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?)

子贡赌着气:是啊,不是吗?(然,非与?)

孔子却说:不是的,我的原则是一以贯之。(非也,予以一以贯之。)

孔子说得很含蓄,但意思很明确:你只看到我博学多能,然而坚持“一以贯之”的做人原则才是我最宝贵最有价值的。

孔子希望子贡能听明白,但是听懂这几句话需要的不是聪明,而是智慧、境界与气度。可惜子贡在这几方面都还欠些火候。

子贡不知道孔子这两句话之间是什么关系,他不知道“一以贯之”的“一”是什么意思,他不明白此时说这话的用意,他更不能体会先生表述得如此委婉含蓄的良苦用心。

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。子贡现在是既愤且悱,可以启而发之了。

当孔子再召子贡来谈及当下的艰难处境时,子贡终于说出了久压心头的话:先生您的学说道理太大了,所以天下没人能容得了先生。先生为何不稍稍降低一点标准呢?(夫子之道至大也,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耶?)

真不愧是“利口”!子贡此话貌似恭敬,实则尖刻,还隐含嘲讽和指教的意味。

孔子感到痛心和失望。他想不到自己的高足竟如此狂傲无知。不过既然子贡亮出了底牌,批评就可以有的放矢了。

孔子一改平日的和蔼,严肃地说:赐!好的农夫只管耕耘而不问收获;好的工匠只专注于巧妙加工而不会去顺着别人的意思;君子只专注于研究完善他们的学说,使之纲目分明,条理清晰,而绝不会去做“容”于谁的事。你现在不去研究你的学问,而去寻求怎么能被人所“容”。赐!你的志向实在算不上远大啊!(赐!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;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;君子能修其道,纲而纪之,统而理之,而不能为容;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,赐!尔志不远矣!)

子贡素来志大才高,自命不凡。志向、才能、格调是他的命门,最是触碰不得。此时他才明白,先生说的“一以贯之”的“一”就是“为道不为容”。而自己竟然要求先生降“道”以求“容”,却正暴露了自己的胸无大志,格调低下。与先生之差别有如天壤云泥!

孔子的批评如重锤击鼓,訇然作响!子贡被震呆了,他一直以来的良好的自我感觉瞬间被击得粉碎!

此后有人再将他与孔子作比,子贡则曰:“夫子之不可及也,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!”

再有人诋毁孔子,子贡则曰:“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,丘陵也,犹可逾也;仲尼,日月也,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,其何伤日月乎?多见其不知量也!”

言语之间除了对先生高山仰止般的尊崇,还带有明显的自我批判色彩。

孔子逝世后,“弟子皆服丧三年,三年丧毕,相诀而去。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”。42岁到48岁,正是能力名声事业如日中天之时。尤其是后三年,子贡一人独守坟前,寒暑易节,风霜雨雪,多次拒绝高官之许重金之聘。实非常人可以为!

子贡的言行令人感动,令人肃然起敬。子贡是幸运的,遇上了孔子这样伟大的先生;孔子也是幸运的,能教育到子贡这样优秀的弟子。

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乃君子之乐也。此言得之。

华亭海·上海浦·下海浦

杨 坤

文化走廊

“华亭海”其名,见于《元丰九域志》。而同书所载泰州海陵县、越州会稽县,俱称“有大海”。可知,“华亭海”是一个特定地理称谓。然而,在唐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和北宋《舆地广记》两书中,无此记载。也许是因为古书流传,会有佚失。熙宁初年郏亶所上水利书,列举松江下游南北两岸的塘浦水利,可谓叙述详尽,但也没有“华亭海”的丝毫踪迹。综合起来判断,似乎《元丰九域志》所载的“华亭海”,在当时就已经是古迹名称了。

类似的蛛丝马迹,其实在今本《元丰九域志》里,还是能找到一些。比如两浙路山阴县“有大江”,淮南西路属县“有大江”,都是指长江。只不过山阴县的“大江”,是《说文解字》“江水东至会稽山阴为浙江”。这样的水利认知,在郦道元《水经注》里尚有部分存留。但北宋人因为对“浙江”与“渐江”已不作分别,所以《元丰九域志》称山阴县“有大江”,极有可能也是记载古迹。正因为华亭海成陆较早,后人对此沧海桑田无从考察,所以在明、清上海方志里,或者把上海县与华亭海等同起来,或者认为华亭海在华亭县东北,或者今以上海县城为华亭海,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论。

以谭其骧为首的多位上海学者,对“华亭海”这个问题,做过一系列比较深入的研究。其中,黄宣佩、吴贵芳、杨嘉祐等学者,认为吴淞江“下游自青龙镇以东,水面宽阔”“估计自始即具备着三角港的雏形”“形成了喇叭形海湾的面貌”“华亭海就是‘沪渎’‘沪海’”,它“北起今江湾镇北,南抵严桥遗址”。他们的意见,与距今7500-8500年埋深-20米沉积顶板高程线的走向,大致契合。

距今7500-8500年埋深-20米沉积顶板高程线,属于全新世滨海沼泽相与滨海相沉积。其走向,大致分为南、北两段。其北段位于今黄浦江下游所迳宝山、市区河道的西侧,并与之平行;南段从龙华往东,横跨今天的黄浦江,至三林拐南,沿惠南西、奉城一线,入今大海。南、北两段,在上海县城一带,形成向西内凹的长条缺口。缺口向西,止于今天的重固、盘龙一带。缺口北侧所在走向,大致接近明、清时期的吴淞江河道;缺口南段的走向,大致接近今天的淀浦河河道。这一缺口部分,属于玉木冰期海退时,大陆河流切割下陷而形成的地理构造。

作为三江之一的吴淞江,沿此方向入海,正是这一地理构造所决定的。而位于缺口西端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福泉山遗址,所出遗物精美绝伦,大概和它处在当年吴淞江入海的要冲,濒临华亭海海湾,有直接关系。后世认为松江正流止于青龙镇,也应当与此地理构造有关。

从嘉庆《松江府志》卷首《乡保市镇图》可以看到,大致沿着诸翟、七宝、朱家行、颛桥、十字庙、陈家行、泗泾、徐泾这一围合范围内的华亭乡三十五、三十六保,恰巧位于青龙镇东南稍远,也就是华亭海海湾的南岸。因此,完全有可能是以其濒临华亭乡的缘故,而得名“华亭海”。如果结合小昆山西侧的华亭谷来衡量,那么东汉末年陆逊受封的华亭乡,比绍熙《云间志》所记载的“在县东北四十里”的区区三保范围的华亭乡,要大出许多。

吴淞江的入海口,从正流止于青龙镇,而逐渐积沙东进,必然也带来了华亭海的沧桑变化。祝鹏认为嘉庆《上海县志》“吴淞江,唐时阔二十里”的表述,“无疑是指(华亭海)海湾的宽度”“大约北起今江湾镇北,南抵虹口港入黄浦江之口”。这个认识,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建筑基础抗震需要,对吴淞江下游古河道开展的勘探调查收获,非常接近。这说明最早“北起今江湾镇北,南抵严桥遗址”的华亭海,后来在海湾北侧今虹口港一线积成沙嘴,成为“北起今江湾镇北,南抵虹口港入黄浦江之口”的古松江下游河道南岸。而古“华亭海”所剩南部海湾,直到“上海浦”“下海浦”形成,而彻底成陆。

根据郏亶的记载,上海浦在下海浦之西,均位于吴淞江南岸。黄宣佩、吴贵芳、杨嘉祐等学者,认为上海浦自南而北注吴淞江下游,为北上沪海(华亭海)的河道;而下海浦则相反,为南下沪海的河道。可见,他们已经认识到上海浦、下海浦的得名,一定与华亭海有关。在杭州湾澉浦镇的方志记载里,有一则关于潮汛“上潭”“下潭”的描述。“上潭”是从镇西南到浙江的潮水,“下潭”是从浙江到镇岸的潮水。“上”是自海而入江,“下”是自江而入海,十分清晰地记录了潮行往复的轨迹。这对于认识“上海浦”“下海浦”的得名来源,及其为何西、东平行于松江下游南岸,极有启发。

大概最早的华亭海,演变为被中间沙嘴分隔成的“北起今江湾镇北,南抵虹口港入黄浦江之口”的古松江下游和海湾南部之后,其江、海潮水,犹如澉浦镇的“上潭”和“下潭”。直到海湾南部也已成陆,其间河道便因古昔江、海潮水的大致走向,而得名为“上海浦”和“下海浦”。

特别的签名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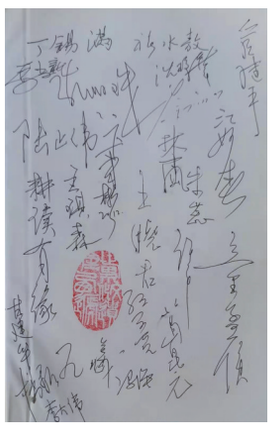
金洪远

茶余饭后

家中书橱里有几十本签名本,那是我在书展或签售会觅得的。唯独一本十年前赴安徽宏村采风的签名本特别受到我的珍爱,上面落满了30多位作家、编辑的签名。

那天参观宏村后,在沿街的书店购得一本介绍宏村的书画集,当店主用长圆形的图章在扉页上留印的刹那间,我突然灵光一现,同行的作家和编辑对我文学创作提携鼓励有加,何不趁此难得的机会请他们(她们)签下大名,给自己一份珍贵的记忆呢?于是,一个个风格各异的签名像花儿一样在这扉页上绽放。

当我请丁锡满老师签名时,他用一口浙江普通话乐呵呵地说,你写的文章有生活,接地气,烟火气很浓,希望保持自己的行文风格。丁老师担任过《解放日报》老总,是沪上新闻界的领军人物,我实话相告,因为缺少知识和学问,我只能写写自己熟悉的生活。李大伟先生刊发在晚报的《野得出,豁得开》的文字深受我的喜爱,请他签名时,我本意是按照签名的顺序一路“下来”,想不到他一下子从扉页上滑到底下角落头,都说文如其人,此刻的他哪能一点也“野不出”。



最有劲的又见王晓君先生。和晓君先生是神交,当年我在海滨小城工作的时候,他通过朋友向名不经传的我约稿,我惊叹他超人的记忆力,数年前刊发在他主编的海派文化小报上的习作,他会如数家珍一一道来。这就不难理解,他先后编著的数本引人入胜的海上文化名人书籍为何受到追捧,如果没有博闻强记和致力于推介海派文化的热心肠,是难以达到的。这也是有人称他为是继郑逸梅、谷苇之后的掌故补白大王的主要原因吧。

真的没有想到,我这个做法,引好几个人仿效,他们表扬我说,你这个点子有含金量,请这么多作家和编辑签名,机会难得啊!

生活茶座

周良弼 书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选登

沪西工人半日学校传播革命火种

邵 唯

昔日小沙渡,泛指上海劳勃生路(今长寿路)东段两侧至苏州河一带地区。20世纪20年代初,当地已成为沪西主要的工业区;集聚的大批工人生活困苦、缺乏文化知识,又被各种封建帮会所控制,互不团结。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,委派李启汉前去开展工人运动。

李启汉在深入调查后,向党组织建议:沿用以往进行平民教育的成例,建立劳动补习学校,帮助工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,并在培养一批工人骨干的前提下,筹建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。经党组织同意,李启汉决定尽快办起沪西工人半日学校,他择址位于上海槟榔路锦绣里的一幢两层砖木结构房屋(后为安远路62弄178—180号,原建筑已不存,现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纪念馆正在筹建),校舍后是英商的白礼氏洋烛厂,周围有空地可用作课余活动;该弄是上海日商内外棉九厂(解放后为上海第四棉纺织厂)建造的工房,共31幢,比较简陋。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的教室,为底层打通的一大间,内放许多课桌、凳子,可坐五六十人;楼上两间,一间为李启汉的宿舍兼办公室,一间为备用教室。

1920年秋,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开学。这是党组织建立的第一所工人学校,由李启汉主持办学并执教,教科书利用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的普通识字课本。

然而,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尽管设于工人集聚地,并是免费的,但来学习的工人却不太多;即使参加者,也常不稳定。通过了解,李启汉得知原因是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长、强度大,一天下来疲惫不堪,已无精力读书学习,只对能使自己稍放松的文娱活动有兴趣。于是,李启汉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,在寒假期间将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暂时改成上海工人游艺会。

1920年12月19日,上海工人游艺会举行成立大会。会场在上海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(今凤阳路186号),400余人出席。李启汉作为大会主席,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,并高声说:“我们从前只是各人苦着,饿着;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,就要大家高高兴兴地联合起来,讨论办法;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而已;什么金钱万能,劳工无能,我们都要改革,打破!”杨明斋、沈玄庐、邵力子等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讲,他们指出:“从前工人没有自悟的原因”都是迷信所致,“什么命运不好呀!没有福气呀!我们赶快打破”;而且,鼓励工人强健精神,努力学习,奋发上进。工人群众很喜欢游艺会这种形式,在活动中慢慢接触到了一些革命思想。

1921年春,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得以重新开学;因上海工人游艺会起到很大的凝聚作用,报名的工人明显增多。上海日商内外棉五厂(解放后为上海第二棉纺织厂)工人黄桂生,年仅17岁,听说起锦绣里有个“新学堂”义务教工人学习,便在厂休日约几个小兄弟去探视。刚走到沪西工人半日学校门口,里面传出熟悉的京戏唱腔,一位穿灰布旧夹袍的年轻教师迎过来,亲切地邀请大家一起听留声机;黄桂生看见已有一些穷哥儿坐着,屋内摆放未油漆过的桌凳,墙上挂着一块黑板,就带头进门。黄桂生在交谈中,方知招呼自己的是该校负责人李启汉。李启汉为了消除拘谨、增进团结,请大家到校舍后空地上踢足球。正踢得尽兴,黄桂生不留神一脚踩在粪坑里,把足球也弄脏了;他怕受责怪,李启汉却和气地安慰,还领着到自来水龙头前清洗。黄桂生对此一直铭记于心,他很快成为工人积极分子,后参加了罢工斗争。

鉴于工人中有的上日班,有的上夜班,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分设白日班、夜校班上课。李启汉为了便于同工人交流,潜心学会上海话,一边教文化知识,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;他反复强调:“工人要尊重自己,努力上进,不要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咱们工人,自己就灰心丧气。我们一定要人穷志不穷。”大家慢慢认识到: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,才能改善生活待遇,获得最后的解放。李启汉还帮助筹建上海纺织工会沪西分会,并推荐学习最认真、热心办事的上海日商同兴纱厂(解放后为上海一〇一厂)工人孙良惠为负责人;随即,孙良惠参加了1921年上海纪念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筹备活动。不久,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对该校产生怀疑,便找借口进行查封。

沪西工人半日学校传播了革命火种。在学员中,不少人后来投身革命,如其中的孙良惠是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位党员,曾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、担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,于1930年10月牺牲。

■每周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■广告电话:021-37687187 ■投递热线:021-57814852 ■本报法律顾问: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(潘峰:13512129634) ■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(电话:021-37212888)